

《大唐西域记》中所载西域女国考论

田 峰

(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摘要 :有关西域女国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本文从《大唐西域记》所记的“苏伐剌拏瞿咄罗”入手,根据学术界前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西域女国的相关资料重新做了梳理。经过分析,笔者认为西域女国的位置在进西藏中部偏南,种族为西羌。经济方面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是一个从母权制国家向父权制国家过渡的国家。单偶婚和多偶婚同时并存。在宗教文化方面,西域女国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和苯教,同时还明显受到中亚其他外来宗教的影响。

关键词 :《大唐西域记》;女国;西域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0)04-0038-06

一、关于女国地理位置的讨论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史籍中有关女国的记载^①至少有以下几个:一是东海女国,即扶桑女国(大体位置在日本海,主要见于《通典》卷186、《梁书·东夷传》及《太平寰宇记》卷175等);二是拂懔国西南海岛女国(拂懔国即指东罗马,此女国应在东罗马西南的海岛上,见于《大唐西域记》卷11);三是位于川西北的东女国(位于今川西北雅州、茂州一代,此女国在新旧《唐书》、《唐会要》、《通典》等文献中多次出现);四是南海女国(见于赵汝括《诸蕃志》“閩婆国”条下,閩婆国即今之爪哇^[1]);五是位于藏西的女国(即《大唐西域记》“婆罗吸摩补罗国”条所附记的“苏伐剌拏瞿咄罗”,为行文方便,此女国本文称其为“西域女国”。)

这些女国有些是据传闻所载,有些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史料的混乱一直是西域女国研究中存疑的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史籍中对西域女国和四川西北女国的记载混淆颇多,有诸多疑点,故我们有必要对这两个女国的史料进行梳理。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女国原本属于同一个国家,川西北女国是从西域女国分出去的一个分支^[2]。我国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亦持此观点^[3],他说:“藏北羌塘地方,当六七世纪时,有强盛牧部曰苏毗,曾征服附近农业部落,建立女性中心制之藩国。其极西之藩国在印度河上游,印人呼曰‘苏伐剌拏瞿咄罗’,华人呼为‘女国’。其东南藩国

在澜沧江流域,吐蕃呼之为‘康’,华人呼为‘东女国’,藩国同俗,皆奉巫教,信鸟卜,迎女王于苏毗。”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可以解释两个女国史料混杂的情况,但是完全用民族迁徙的观点来解释这两个女国,使人难以信服。如果“迁徙说”成立,这一迁徙应该发生在唐以前,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汉文典籍中只字未提,而且青藏高原考古发掘也没有一点迹象表明这种迁徙的可能性。

那么,西域女国与川西北女国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在唐人的记载中这两个女国未曾有太大的混乱。西域女国的地望基本可以确定为: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珂国。川西北之女国在雅州、茂州一带。这两个女国在唐以后的典籍中开始出现混乱,如《新唐书·西域传》云:“东女,亦曰苏伐剌拏瞿咄罗,羌别种也,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西属三波珂,北据于阗,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4]《新唐书》对女国的记载是混乱的,党项在积石山之南、茂州之西北,吐蕃在茂州之西,此女国何以“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东南又“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似乎从川西一直到大勃律的整个青藏高原北部都属于女国,这显然与吐蕃在隋唐时期占据着青藏高原北大部分地区的史实是不相符的。吕思勉先生对这一史料的现象做出了解释,他说:“唐时之女国,人皆知其有二,而不知其实有三焉。盖今后藏地方有一女国,四川西

收稿日期 2010-09-08

作者简介:田峰(1980-),男,甘肃会宁人,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境,又有一女王,新旧《唐书》之《东女传》,皆误合为一也。”新旧《唐书》“揉两说而为一,而不误其地相去数千里也,亦可笑矣。”^[5]唐以后的很多史籍中承袭了这种错误,我们应当注意区别。

记载女国的文献很多,主要有:《西域图记》(已佚)、《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往五天竺国传》、《北史》、《隋书》、《通典》、新旧《唐书》、《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文献通考》等,这些史籍中史料混杂时有出现,如何对这些史料进行辨别梳理呢?吕思勉先生在《吕思勉读史札记》“女国”条中对这两个女国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辨析^[6],基本梳理出了这两个女国的材料。这些史料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大唐西域记》、《释迦方志》、《往五天竺传》等书;另一系统是《隋书》、《北史》。《隋书》和《北史》等书中有关西域女国的记载主要来源于裴矩所撰的《西域图记》(原书已佚),而《西域图记》中的资料是裴矩诱令诸商胡所得,“诸胡商”中具有西域女国的使者的可能性很小(在中国隋唐时期的典籍中无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证明西域女国与中原的交往)。所以,裴矩所得西域女国的资料传闻成分更多,史料混杂现象也时有出现,这一点吕思勉先生已经指出。《大唐西域记》、《往五天竺国传》、《释迦方志》这一史料系统的可靠性要高于《隋书》、《北史》这一系统。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无疑属于西域女国,由于川西北的女国与唐代存在地缘上的关系,所以后来史家在得知川西北女国后,把很多西域女国的材料误入了川西北的女国,从而造成了材料的错讹。

今人霍魏先生通过对文献中所载的两个女国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社会组织以及文化面貌诸方面的分析,并结合在西藏吉隆出土的《大唐天竺使出铭》对西域女国的地望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勘定。他认为这一女国在今西藏中部偏南,与碑铭中所记“小杨同”的位置差不多。他对史料的混乱也作出了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可以发现史籍中所载的东部女国,由于其在地理位置上事实上是位于西藏中部的小羊同(小杨同)国接近,但以往史家却又泥于《通典》所载之大小羊同的地理位置的错误而不能辨,最终造成了《新唐书》等将小羊同(小杨同)国与大羊同的地望混为一谈,从而出现了‘东女亦曰苏伐刺拏瞿咄罗……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河,北距于阗’这样的错误。所以,笔者认为,将本为大羊同之异名的‘苏伐刺拏瞿咄罗’(亦即所谓‘金氏’)冠之于东部的女国头上,本来同属是对大、小羊同地理位置

的模糊不清而造成的错误,如果一定要用因所谓‘民族迁徙’而出现的‘本家’与‘分家’来加以结实的话,只会进一步增加史料的混乱,是不可取的。”^[2]霍先生结合考古材料得出西域女国的地理位置,并就文献资料的混乱记载进行了梳理,是可信的。

通过上面的论述和考古材料证明,笔者认为西域女国的地理位置应在今西藏中部偏南。

明确了西域女国的地望,我们再来看《大唐西域记》对此女国的记载:

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刺拏瞿咄罗国,出土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羊马。气候寒烈,人性躁暴。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河国。^[3]

玄奘这里所描述的女国无疑就是西藏中部偏南的女国,他行至北印度境的婆罗吸摩补罗国时据传闻兼记了苏伐刺拏瞿咄罗国。根据《大唐西域记校注》注释云苏伐刺拏瞿咄罗是梵文 Suvarṇ-gotra,乃黄金家族之义^[7]。此地出土黄金,故有此名。

二、西域女国的种族、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和宗教文化初探

1. 种族

关于西域女国是何种族,《大唐西域记》中没有明确记载,只言其为金氏。新旧《唐书》言其为羌之别中也。吕思勉先生认为其应当为天竺族类^[8],原因是:《隋书·女国传》谓其“俗事阿修罗神”,《旧唐书》说“文字同于天竺”,《旧唐书》言“风俗大抵与天竺同”。《隋书》中记载其“王姓苏毗,字末羯”。^[9]苏毗,在《新唐书·西域传下》作“孙波”,在敦煌的古藏文的古藏文文献中,苏毗曾多次出现^[4],为“sum pa”或“sum ru”,即孙波茹,“ru”是藏文“地方”之意^[5]。可以看出,在当时苏毗已被吐蕃兼并而成为吐蕃的一个地方。其王种在中国古代的史籍记载中多为“西羌”种,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没有太多疑问,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其种族为羌^[6]。至于吕思勉先生仅凭西域女国与天竺文化上的相似性就断定其为天竺族类,值得商榷。

2. 经济生活

西域女国由于在青藏高原的西北,海拔较高,故《大唐西域记》言其气候寒烈,此与《隋书》所记的“气候多寒”相似,此处不再赘述。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西域女国的物产,《大唐西域记》载其土宜宿麦,多畜养马。何谓“宿麦”,宿麦就是隔年成熟的麦

子,在汉武帝时,由于南方水灾严重,所以推广种植宿麦,《汉书》:“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颜师古注曰:“秋冬种之,经岁乃熟,故云宿麦”。^[10]汉文文献将隔年的麦子笼统地称为“宿麦”,其实宿麦的品种很多。从青藏高原的气候特点来看,青藏高原更适合种植大麦的一种——青稞。青藏高原气候寒冷无霜期长,更加适合青稞的生长,它在青藏高原先民的生活中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隋书》中提到的西域女国的物产还有鎗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和盐^[11]。但是这条史料令人疑惑,此女国何以出蜀马呢?这一点吕思勉先生已经指出,他说:“葱岭南所出之马,必不得谓之蜀马,将盐向天竺贩与天竺战争,必葱岭南女国而后能之。”^[12]黄金、鎗石、朱砂是西域女国的主要矿产。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物产就是食盐,食盐在整个羌塘高原上是很丰富的。藏文文献《汉藏史籍》中有这样的记载:“曩日伦赞‘将野牛肉驮在马鞍上,因牛肉拖地而发现了盐湖,此前吐蕃有少量岩盐,此后吐蕃人即食用羌塘的湖盐。’”^⑦为了得到食盐,朗日松赞“征服了甲与吐谷浑。自北方得到了盐。”^[13]这里的“北方”很有可能就是西域女国。但林梅村先生认为:“苏毗人向印度贩运的食盐不一定是本地的物产,而是来自苏毗北方盛产食盐的罗布泊。”^[14]这与藏文史籍的所记载的羌塘高原有大量的食盐的史实有悖逆。据一些史学家推测,在天竺与西域女国之间,形成了一条以输送食盐为主的“食盐之路”,这条道路同时也承载着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

除了食盐,鎗石和麝香也是西域女国很重要的物产,这两种物品在丝绸之路上也是司空见惯的。鎗石最为著名的产地在波斯,很多汉文文献提到,波斯的鎗石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丝路来到中国。西域女国在丝绸之路所直接影响的范围内,这种物品出现在其地就不足为奇了。麝香是青藏高原以品质著称的物品之一,主要输往西亚和欧洲,吐蕃兼并西域女国之后,麝香产量大增,这一奢侈品也迅速成为丝绸之路上风靡一时的物品,在西方的史籍中对吐蕃的麝香赞不绝口,雅库比在《阿巴斯人史》(1872年成书)中说:“最好的麝香是吐蕃麝香,其次是粟特麝香,再次是中国麝香。”马苏第《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中说:“有麝香羊生存的吐蕃地区与中国地区毗邻,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吐蕃的麝香比中国的质量好。”^⑧

3. 社会结构

西域女国是一个母权制的国家。《大唐西域记》言:“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惟征伐田种而已。”《隋书》,曰:“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丈夫唯以征伐为务。……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妬忌。”^[15]可以看出,妇女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耕伐之事由男人负责,“夫亦为王”,说明其社会组织形式有向父权制过度的迹象。

大多数学者认为,西域女国的婚姻制度是一妻多夫制,这一观点过于武断,值得商榷。在多数社会中,男女的比例一般是1:100:103,若普遍实行一妻多夫制显然是不合情理的。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多偶婚与单偶婚同时存在的,一夫多妻制主要流行于首领、富有者等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所以,笔者倾向于西域女国有一夫多妻制现象,但不是普遍现象。“夫亦为王”,随着男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婚姻制度也会发生变化,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相对稳定的对偶组合慢慢成为主流。

《隋书》:“其女王死,国中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此为小王。”^[16]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当时的婚姻制度相适应,西域女国的继嗣方式是以女方为世系的母系继嗣,这个母系继嗣群体是有共同的祖先组成的。

4. 宗教文化

《大唐西域记》中只字未提西域女国的信仰和丧葬,但《隋书》等文献中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隋书》曰:

贵人死,则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祭毕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视之,有粟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17]

可以看出,西域女国贵人的丧葬主要采取的二次葬的方式,他们把尸体经过处理和以金屑先置之瓶内埋之,过一年之后又置之铁器葬之。这种丧葬方式应当具有某种古老的暗示作用,或与当地的信仰有直接的关系。关于西域女国的宗教信仰,文献中无明确记载,我们试图通过对其周边国家或地区宗教情况的考察,为了解西域女国的宗教信仰提供一点线索。下表是笔者根据《大唐西域记》所记与西域女国比较临近国家或地区的宗教信仰情况所列^⑨:

国名	佛教发展情况	其他宗教发展情况
瞿萨旦那	崇尚佛法。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与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	
钵露罗	伽蓝数百所,僧徒数千人,学无专习,戒行多滥。	
健驮罗	伽蓝十余所,摧残荒废,芜漫萧条。诸窣堵波颇多颓圯。	多敬异道,少敬正法。天祠数百,异道杂居。
乌仗那	崇信佛法,京信大乘。夹苏婆伐堵诃,旧有一千四百伽蓝,多以荒芜。	天祠十余所,异道杂居。
滥波	解缆十余所,僧徒寡少,并多习大乘法教。	天祠数十,异道甚多。
呾叉始罗	崇敬三宝,伽蓝虽多,荒芜已甚。僧徒寡少,并学大乘。	
僧诃补罗		
迦湿弥罗	邪正兼信,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	
曷罗闍补罗	伽蓝十余所,僧徒寡少。	天祠一所,外道甚多。
屈露多	伽蓝二十余所,僧徒千余人,多学大乘,少习诸部。	天祠十五,异道杂居。
闍烂达罗	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专门习学。	天祠三所,外道五百人,并涂灰之侣也。
设多图卢	敦信佛法,诚心质敬。	
萨他泥湿伐罗	伽蓝三所,僧徒七百余,并皆习学小乘法教。	天祠百余所,异道甚多。
秣底补罗	伽蓝十余所,僧徒八百余人,多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王,戍陀罗种也,不信佛法,敬示天神。……天祠十余所,异道杂居
婆罗吸摩补罗	邪正兼信,伽蓝五所,僧徒寡少。	天祠十余所,异道杂居,多信外道。
瞿昆霜那	伽蓝二所,僧众百余人,并习学小乘法教。	天祠十余所,异道杂居。
歪醯掣罗	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九所,异道三百人,事自在天,涂灰之侣也。
阿耶穆佉	伽蓝五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十余所,异道杂居。
劫比萨伐窣堵	伽蓝故基千有余所,而宫城之侧有一伽蓝僧徒三千余人。	天祠百所,异道杂居。
尼波罗	习学小乘正量部法。	

从以上西域女国周边地区的信仰来看,呈现出佛教与外道并行的局面,佛教衰落的局势明显,而异道的发展异常活跃。没有迹象表明佛教在此之前对西域女国产生影响,但其他外道势必对西域女国产生了影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这种影响,意大利

人图齐在论述象雄时曾指出:“‘象雄’这一地理名词一般指吐蕃西部,但同样也用作指从该地区向西向北和东延伸的一块其宽度极不均匀的地区的名称(在那里共使用八种重要语言和二十四种次要语言)。大家海提到了一些原籍为迦湿弥罗(克什米

尔)、汉地以及苏毗的大师们。勃律以及迦湿弥罗形成了一个主要借鉴自湿婆教的宗教地区。”图齐所指的“这一极不均匀的地区”事实上也包括了西域女国,而且这里还提到了“苏毗的大师们”。西域女国地处西亚、中亚、南亚、三种文化碰撞的夹心地带,受到一些外来宗教的影响自在情理之中,从上表西域周边外道发展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至于其是否受湿婆教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暂且不论。

在这里要特别留意象雄(汉文史籍作“羊同”)文明与西域文明的相似性。羊同有大小之分,大羊同在“今西藏西部、藏北高原以及后藏日喀则地区的北部之一部。”^[19]小羊同在“今西藏中部偏西处”^[20]。才太让先生给象雄一个大致的轮廓:象雄的最西端是大小勃律(吉尔吉特),即今克什米尔。从勃律向东南方向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延伸,包括今印度和尼泊尔的一小部分领土。北临葱岭、和田,包括羌塘。但东西的边界就不太清楚^[21]。可以看出,这一地区与我们所述及的西域女国在地理位置上是接壤的。象雄最突出的文化特质,就是本教(或作苯教)文明。本教并非产生于象雄,一般认为其来自于大食(Stag gzis)^⑩的俄摩隆仁(vol mo lung ring),^⑪创始人为辛绕米沃,本教的前身即盛行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⑫。西域女国处在本教文明的传播通道中,很自然受到了这一文明的影响。法国学者石泰安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吐蕃第一位赞普曾受到个民族和地区的苯教徒们的欢迎,他可能在之前就已经‘征服’了一位苏毗的苯教徒。”^[22]这里提到了一位苏毗的本教徒,可见本教文明对西域女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前面《隋书》中有关西域女国的鸟卜、祭祀方式的记载也隐约证明了这一点。

《隋书》在论及西域女国的信仰时提到了“树神”,这是值得注意的。树木崇拜是青藏高原岩画中屡见不鲜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北方的岩画中却很少表现,它与宗教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西域女国的地望之内,曾经发现了有关树木崇拜的岩画,其中以曲嘎尔羌岩画为代表,有学者已经开始留意这些岩画,张亚莎先生认为曲嘎尔羌岩画中“表现的有树神信仰的古代族群很可能正是《隋书》、《北史》中记载的女人国。”^[23]而且张先生对信奉阿修罗神、事树神与鸟卜之间的联系也作了论述,他认为:“阿修罗神崇拜、‘事树神’、鸟卜这三者之间的奇特组合在藏北纳木湖的洞穴岩画中几乎可以说是得到了丝丝入

扣的展示。在那些情绪热烈的祭祀场面中我们分明看到了树、塔(代表着来自佛教或印度教的象征性崇拜)、鸟这三者伴生或结合的现象,比较常见的是塔与树的组合方式,也有树上栖息着鸟的图形,甚至还能看到一种显然比较特殊的组合方式,即将塔、树、鸟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图形。这种塔、树和鸟处于显著地位的画面中。人们或翩翩起舞、或是进行一些可能与丧葬仪式有关的祭祀活动,可见其宗教意味是相当明确的。”^[24]这些岩画的发现很好地解释了西域女国比较独特的文化特质。

三、结论

西域女国自隋唐以来不断地出现在我国古代的典籍当中,人们更多地抱着掠奇的态度来研读西域女国的历史,因而它的历史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即使是正史当中的记载,也将西域女国和川西北女国的资料杂糅在一起。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唐人误将两个国家混为一谈,造成了资料长期错讹的情况。《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西域女国从史料的来源上看,其可靠性程度更高,玄奘虽未亲旅其地,但他所到的婆罗吸摩补罗国距离西域女国不远,再加之玄奘《大唐西域记》写作的客观态度,所以《大唐西域记》中有关西域女国寥寥数语的记载,对我们研究西域女国有很大的价值。本文笔者以《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西域女国为基础,同时参考其他史籍中的一些资料,从种族、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几个方面对西域女国的情况作了简单的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西域女国在种族上来看属于西羌种。经济生活方面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兼及农业,生产黄金、鎗石、麝香、朱砂、盐等物品。该国属于从母权制国家向父权制国家过渡的母权制社会,单偶婚和多偶婚同时并存。由于受到外来宗教的影响,西域女国的信仰情况较为复杂,原始信仰和苯教信仰存在的同时,不排除其他宗教在该国的发展。在丧葬方式上主要采用二次葬的方式。

【参考文献】

- [1] 冯承均.诸蕃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6:22、73-74.
- [2] (日)山口瑞凤.东女国与白兰[J].东洋学报,54/3:1-56.
- [3] 任乃强.隋唐之女国[J].康藏研究月刊,1947(6).
- [4]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221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18-6219.
- [5] [6] [8] [12]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下)[M].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2:1079、1079-1084、1080-1081、1080。

[7] (唐)玄奘、辨机.大唐西域记校注[M].季羨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408。

[9] [11][15][16] [17](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850、1850-1851、1850、1851、1851。

[10] (汉)班固.汉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4:177。

[13]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38。

[14]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0:427。

[18] 图齐.西藏宗教之旅[M].耿昇译,王尧校订.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316。

[19][20] 霍巍.从新出土的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J].民族研究,1996(1):97、96。

[21] 才太让.古老象雄文明[J].西藏研究,1985(2):97。

[22]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M].耿昇译,王尧审定.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273。

[23][24] 张亚莎.阿里日土曲嘎尔羌岩画试析——附论岩画与女国·苏毗相关问题[J].中国藏学,1999(2):63、65。

【注 释】

① 关于女国的记载在中国古代的典籍当中有很多版本,其他国家的一些文献资料当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这反映了母权制社会在大多数地方存在的合理性。本文就中有国古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女国的记载所做的简单的统计,统计未必全面,但能够反映出女国文化在某段时期的普遍性。

② 霍巍《从新出土的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民族研究》,1996年第一期,第98-99页。《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境内发现的摩崖石刻,霍巍先生对这块碑铭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参看《〈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日》,《东方学报》,京都第66册,1994。另一文是《〈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

③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8页。此段季羨林等人的校注中,对西域国的问题做了阐发,注中对此女国的地理位置采用了学术界的一般观点,认为此女国是古代西藏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国,尚处于母系氏族制度时期,地理位置在今喜马拉雅山以北,于阗以南,拉达克以东。此注见于本书409页。

④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45-156页。主要出现在《大事记年》当中,孙波茹以采甲秀达巴园为中心,东至尼域包木那,南至尼迷曲那,西至叶尔夏卜丁保且,北至那秀司仓,成为吐蕃的五茹之一,见于本书208页。

⑤ 西域女国的女王虽姓苏毗,而且西域女国和苏毗在文化上有很多相似性,但不能把西域女国和苏毗完全等同,以往学术界理所当然地认为苏毗和西域女国是同一个国家,这一观点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石硕先生在《西藏研究》上发表了《女国是苏毗吗?——论女国与苏毗之差异及女国即苏毗说之缘起》,详细地论述了西域女国和苏毗的不同,文章对导致女国即苏毗一说缘起的两条关键性史料即女国“王姓苏毗”和附国“西有女国”进行了深入辨析,发现这两条史料并不足以支撑女国即苏毗之结论(2009年第三期)。

⑥ 羌,具有广泛的含义,在某些历史阶段,羌甚至是对活动在甘青地区的游牧部落的通称。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就已经记载了羌人在黄河流域的活动情况,汉时期羌人的势力逐渐的强大,羌人往往跟匈奴等中原周边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汉朝,东汉后期羌人经过大规模镇压,大多数定居于甘肃、青海一带,有的建立政权。另一部分继续西迁,在青藏高原建立了政权,西域女国很可能就是迁到青藏高原的羌种人建立的政权。

⑦ 《汉藏史籍》汉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7页。囊日伦赞(或作朗日松赞),为吐蕃第三十代赞普,松赞干布之父,《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作赤伦赞或伦赞隆南木,《新唐书》作论赞所,“朗日松赞”是在吐蕃灭苏毗后部下对他的尊称,后被朝中的权臣与王室亲属合谋毒死。

⑧ 转引自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麝香在吐蕃时期是很重要的物品之一,也是西域女国的主要的出口物品,吐蕃兼并西域女国后,这一物品沿着罽宾道和勃律道输送到中亚和欧洲,罽宾道和勃律道在丝绸之路文化影响的范围之内,是丝绸之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⑨ 此表仅选部分在地缘上与西域女国接近的地区以作参考,在选择上无具体的标准,空白处表示《大唐西域记》对其宗教发展情况无记录。

⑩ 对“Stag gziz”译为“大食”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质疑,如王小甫认为“本教史上的 Stag gziz 十有八九指波斯而不是阿拉伯”(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199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页)

⑪ 卡尔梅《本教史》,王尧、陈观胜译,《国外藏学译文集》(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Gshen rab mi bo)关于俄摩隆仁,才太让说:“俄摩隆仁有两个,即达瑟的俄摩隆仁和象雄的俄摩隆仁,前者是文明的中心,后者则是地域的中心。作为地域中心的俄摩隆仁,当在象雄本地,此地名在今天的阿里可找到,不再赘述。而达瑟的俄摩隆仁则完全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臆造的一个精神世界”(《古老象雄文明》,《西藏研究》,1985年第二期,第99-100页)

⑫ 琐罗亚斯德教,即火祆教、拜火教、祆教、火教等,主张“二元论”,尊奉《波斯古经》为经典。